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一）	王复兴
【史实辨析】	林彪的一号命令与“谜”无关	舒云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6月—1968年8月（五）	樊能廷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一）

• 王复兴 •

3、争取入团

我是高一（北京四中）那年加入的共青团。在那个年代，入不入团，是一个青年优秀与否的标志。入了团才会感到有了人的尊严。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团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班里团支部批准、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后，等了很长时间上级没批下来。我就去问班里团支书李峻，我的团员资格怎么还没批下来？第二天，李峻让我去找校团委书记赵济敏老师。我找到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城区团委会，找一下区团委书记，区团委要和我谈话。我想一定是找我谈家庭问题。我那时在学校填写学生登记表，“家庭成份”一栏是写“职员”，按当时的标准是不红也不黑。但问题不在这里。下面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父亲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中文报纸《中西日报》任编辑。我们全家都跟着父亲在旧金山居住。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父亲每天晚上在家油印、发行《远东通讯》。《远东通讯》是受中共香港地下党新闻机构《国新社》委托并由其供稿。《国新社》是由乔冠华、刘尊棋、刘思慕、金仲华等人领导，他们与父亲相互联系频繁。《远东通讯》在美国宣传中共政策，并报导解放战争进展及发表评论。当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常在家帮助父亲油印《远东通讯》，然后跑邮局寄出。

1986年9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題，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大百科”发给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写的是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天，1949年10月6月旧金山爱国华侨在“同源会”礼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父亲参加了庆祝会。庆祝会进行期间，遭到国民党人的袭击。父亲头部遭到铁器重击，头破血流。我当年六岁，记得深夜父亲回家，

头上缠绕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和弟弟都吓坏了。第二天旧金山国民党控制的《旧金山日报》出了《号外》，写道“殴伤有共产党匪徒王福时一名，伤势较重。”其实父亲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自认为是共产党的挚友。此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回祖国，建设新中国。回国前，父亲曾专程去拜访了钱学森，动员他回祖国效力。我仍模糊地记得，父亲那天开着辆刚买不久的新车，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所大学（后来得知那是钱学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一到目的地，父亲就因晕车吐了。到了钱宅，那是一间别墅，前花园有很多花，很漂亮。钱学森夫妇满脸笑容走到花园迎接我们全家。

1950年6月，父亲携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向父、母告别并送行。于凤至托母亲回国后帮她寻找老保姆。但回国后父母便无法和美国友人再联系了，从此失联。（这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回国后两个月，父亲即被胡乔木任命为国务院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1952年成立国际书店，外文书籍的出版、发行业务归口到国际书店。父亲被调至国际书店，先后任出口部、进口部副主任。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爸那时左倾得很。”左倾，拥护中共，是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状态。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同情、支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个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刚刚进城，还很清廉。

按说1950年前后父亲的历史按中共的政治标准，一点问题没有，但要命的事发生在1957年整风反右时期。父亲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了鸣放，并于1957年8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他所在单位“国际书店”的文章《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大量进口苏联报刊、书籍，却极少量进口欧美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科技类的报刊，书籍。该文指出：“因此在读者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个卖俄文的书店。”“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老师对久已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就是这样一篇出于善意但较尖锐的批评文章，惹来大祸。父亲及《文艺报》轮值主编萧乾为此被同时划为右派。195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点名批判右派王福时。批判王福时“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同时，父亲在单位遭到大会、小会批判。我在1997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时，曾写信对父亲说：“你当年被划为右派，是你人生光辉的一页。我为此而骄傲。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批评了文化领域的闭关自守，批评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年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只是想批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我告诉父亲，我当年在学校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父亲表示理解。

1957年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父亲是右派的文章后，很苦恼，根本不相信父亲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会是反动派、坏人。但上高中后争取入团，就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从政治思想方面和父亲决裂。必须“存天理，灭人欲”，用党性灭掉人性，克服温情主义。那次到北京西城区团委会与团委书记谈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而去。团委书记要我谈谈对家庭的认识。我批判了父亲57年的文章，说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实际上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揭露父亲在家里与朋友议论中苏论战，欣赏苏共“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批判这是欣赏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立场有问题。还批判父亲怕孩子们吃不饱饭，骑车到保姆郊区农村家里买大白菜，是困难时期对形势悲观，对党不满的表现，等等。表示要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父亲进行了深刻批判后，区团委书记挺满意。过了几天，我的团员资格便被批准了。得知这消息，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挺光荣。当年对父亲进行批判、划清界线，一半是违心的，如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入不了团，甚至上不了大学；还有一半是真诚的，当时所受的教育让我认为父亲的立场、观点有

问题。解剖自己的思想，向内心深处挖掘，更多的情绪是埋怨，埋怨父亲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情绪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有。

对这种埋怨情绪，我举个例子。父亲1988年到美国探亲，看望在美国定居的妹妹王丹娜和两个弟弟王复明、王复强。王复明在美东一间大学研究院攻读MBA。父亲王福时在美国一入境，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找到王复明，问王福时来美国干什么来了。父亲于1949年10月6日在旧金山庆祝建国而被打伤之事，FBI竟然仍保存在档案里。当时冷战尚未结束。那时，王复强、王复明赶紧写信让父亲千万别来看自己。王复强不放心，信里写了句狠话：“以前在国内你耽误了我几十年，现在还要耽误我吗？”父亲自然是不敢去看望两个儿子了。那个FBI警探与王复明是美国同一个大学研究院的校友，后来与王复明一起喝咖啡，告诉他怎么回事，并说：没事了。我纳闷的是，父亲在1948、1949年的事，在冷战时代被美国政府注意并不奇怪，相反在中国怎么也成了负面因素，成了向往西方、对党不满的因素呢？甚至株连后代？两大阵营冷战，父亲不应两头不是人啊！笔者在文革中就曾多次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而惹来麻烦、困扰。我7岁随父母从美国回国，在文革中成了我的历史污点。

## 5、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革军’），穿著很朴素、骑自行车上下学，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课余时间他们喜欢不分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按我们那一年级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氛围。按我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是当然的接班人应“坐天下”。由于当年我在学校是优秀运动员，曾蝉联三届北京中学生田径运动会400米冠军，并是学校足球队队长，这些高干子弟普遍喜欢体育，另外我也对国内外大事有兴趣，特别是较关注中苏论战，因此与他们许多人挺谈得来，关系也融洽。但对他们那种高人一等的劲头儿、张口闭口总是谁谁的爸爸是谁，谁谁的爸爸说什么了，干什么了，来谁家看谁的爸了，张口闭口自己的“爸爸”等等，颇看不惯。四中的学潮及尔后的社教运动是由这些高干子弟推动起来的，否则根本不会在四中发生这场运动。

1964年10月北京四、六、八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1964年秋季的“468学潮”。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

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曾发生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学潮自此温度骤升。而后过了二、三天，在同一天，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笔者在外班高三3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穷之子）一篇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

高三6班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鲁生卫的斗争。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1949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同班同

学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的时候到了……”。（以上文字经多方核实，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等。

接着在高三6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来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2分，他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但过于简单，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5分，高干子弟苏承德（海军司令苏振华之子）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候，周××大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说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连推带桑往讲台那边推。另一同学又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他们用力按鲁的头，让他低头。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治方向。”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了下课，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同学：“你怎么了？”李泣不成声地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想不到的竟然是庞××下的一个套。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说找不到了（已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鲁离开座位，他们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代表班干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能躲开自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这种“护送”使他暗存感激之情。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关心和鼓励。

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鲁生卫交待反动思想，鲁没什么可交待的，只好保持沉默。批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烈，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6班七、八个人一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他对象。

鲁逢此遭遇，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恳地道歉。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友。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研究员，成为机电专家。鲁对我回忆四中往事，说：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我发

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时代。”“历史已经翻篇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非常不愿意纠结和缠绵哪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鲁要求笔者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的平静，影响正常生活。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他伤害之深。

（注：为着尊重当事人再三要求不要披露本人姓名的要求，以上“鲁生卫”之名是笔者用的假名。）从以上高三6班鲁生卫的个案，可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对青年学生影响之深。

紧接着，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1959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生父据说49年后去了台湾。）被刘安东（父亲刘澜波是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经过改选程序。刘安东在会上点了我的名，说“大家知道，王复兴也有问题。”刘安东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大概是没法说明白。我自己寻思了好久，我的问题可能有二条：一条是作文里讲“青年学生必须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条从那个方面都没法下手批；再一条可能是家庭问题，我那时曾交给团支部十几页的思想汇报，批判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这是自觉革命、思想汇报，也不好拿出来批判。因此刘安东只能含糊含糊说有什么问题。后来我的问题没了下文，并没整过我。我算是在运动中受了点小小的冲击，只苦恼了一小阵儿。

在我们班发生夺权的同一时间，高三6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由于高艳华的出身并不是黑五类，因此由支书改任班长；高三3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他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15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先后与林彪、叶剑英有过矛盾。1950年在广州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籍、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1954年6月7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化。陈光于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纪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四中的学潮中曾发生了一件十分新奇、怪诞的事情。高三2班曾发生一件几个外班团支部跨班到2班发展团员之事，目的是为着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发展一名高干子弟入团。高三2班的学生李新桅（李井泉之子）不怎么求上进，不是团员。李新桅是由四川成都转学到北京四中上高中的，在四中住校，每个周末到贺龙家住。李井泉每次来京开会，李夫人都会到四中把儿子接走，有时正值上课时间，李太便会直接到教室门口吩咐老师把儿子叫出来接走。李新桅被父母接走一个礼拜左右，回校后通常气色很好，有的同班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他“又胖了一圈”。据说有的同学与他开玩笑时，摸他的头玩，嘲笑他，于是有的高干子弟同学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感情问题，是仇恨干部子弟。为发展李新桅入团，高三2班在阶梯教室召开了“联合团支部大会”，由高三几个外班团支部批准李新桅入团。而后高三2班团支书任小彬再召开团支部会议，批准、补办了李的入团手续。此事，已显露出了后来那个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血统论思潮的初端。似乎高干子是“自来红”，入团有优先权，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在学潮中，不仅是前述高三6班发生了学生斗学生，批判思想“反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之事。高三2班批判了马巨同学。马巨的父亲马宗霍是国学大师、教授。马巨学习成绩很好，有点傲气，与同学关系不是很融洽。马巨被批判阶级感情有问题，有人揭发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一次他们班到北海公园参加科技之家活动，回家路上，碰上一个衣衫破旧、褴褛的要饭的，马巨对同行同学说“这要饭的，风餐露宿，这么苦。看照片毛主席是穿皮大衣呀。”还有一次全班到天安门参加抗美援朝群众大会，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同学们狂呼“毛主席万岁！”表现得十分狂热，而马巨被揭发表情平静、无动于衷。马巨被批为反动、反革命，被定为反动学生，没能上大学。他文革后在美国从事计算机管理工作。文革后同班校友聚会，同学们敞开思想畅聊，马巨惊讶地发现，国内校友们对党国体制弊病的认识、对神化领袖的祸害、对普世价值的理解，比自己深刻得多，说“我当年是右派，你们现在各个比我还右派！”高三2班当年的团支书（高干子弟）任小彬多次诚恳地向马巨道歉，令马巨感到十分安慰。

受高三年级学潮的影响、低年级也闹了起来。例如高一年级也未能幸免，也发生了批判学生的事情。当时高一2班的教室后墙上曾贴满了批判牟志京（父亲是知识分子、翻译）的小字报，有的小字报揭露他爷爷49年前是大富豪（其实他祖父在49年前早已破产）；有的小字报因他奶奶公私合营后曾领取过些微定息，因而说他奶奶有“变天账”，要他交待；有的小字报批判他有资产阶级恋爱观，只因他有一次碰上小学的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对他“朴哧”一笑，他开玩笑说有艳遇。有的同学还把他日记中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批判。文革爆发后，牟志京坚决反对血统论对联，在校内外到处与“老兵”辩论。他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了《中学文革报》，曾刊登过遇罗克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发表的《出身论》，在文革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注1）

当年推动四中学潮发展到社教运动的是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高三的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组。主要核心成员有：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宋克荒（宋任穷之子）、杨东胜（杨成武之子）、萧云（萧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刘澜波之子）。邱承光是主要召集人。他们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萧云家。杨东胜其实政治热情并不高，他与笔者私交不错，私下对笔者讲，“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设祖国。”他在核心圈只不过挂个名，跟着跑。杨东胜之所以属于核心小组成员只因为他爸是杨成武。开始核心圈人较多时，有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时任驻法参赞）等人，他们后来淡出了核心圈，皆因父辈不够军级部级以上官位或父亲不是中央机构的高官。从以上高干子弟核心圈组成的潜规则，可以看到高干子弟头脑中那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这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应是既来源其父辈无形的影响、熏陶，也来源于体制的潜移默化。

从以上四中学潮中学生们的思想、行为，可看到狼奶（阶级斗争观）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心影响之大。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活、学习在同一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1964年底，学潮发展到社教。四中闹起学潮时，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问题，排斥革军、革干、工农子弟；出身地富、资产阶级的领导、教师重点培养出身地、富、右派、资本家的子弟；学校不培养革命接班

人，而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一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邱承光、苏承德、宋克荒、杨东胜、刘安东、萧云、宋扬之等人。写信日期是1964年12月20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一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傅洋（彭真之子）递交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收到信后，于21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发信一周后，27号左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出面接见了四中高干子弟三名代表：邱承光、宋克荒、苏承德。此次接见，张文松主要是听取意见，了解四中高干子弟想法，以便向彭真汇报。紧接着，北京市委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出面第二次接见四中高干子弟，地点在台基厂北京市委大楼大会议室。这次四中去了几十个高干子弟，已毕业没考上大学而转到清华附中重新上高三的贺鹏飞（贺龙之子）也去了，他坐在宋扬之旁边。记得笔者那天上学，没见到刘安东，有同学告诉笔者，万里接见他们，刘安东也去了。过了一、二天，会议情况陆续传出，据说万里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2分比白5分好，我看还是白5分好。”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才对，我会找你爸爸谈谈。”万里宣布：现在出“安民告示”，北京市委将派工作组进四中。

彭真派工作组进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终止学潮，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据李晨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文记载，北京市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四中的日期是：1964年12月28日。

为着便于与高干子弟沟通，做思想工作，工作队的副队长有几位高干夫人，如副队长杨滨是时任国家经委、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副队长孙岩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函的夫人。四中高干子弟见她们，称呼：“杨阿姨”、“孙阿姨”。

四中社教刚开始时，工作队很神秘，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样，搞“扎根串连”。工作队住在四中附近的平安里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他们分别找高干子弟中的学潮积极分子谈话。苏承德回忆说，工作队与他谈话时对他讲：你们有革命热情，这应充分肯定。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四中的领导是修正主义？还是革命的？要具体分析，头脑不能发热。学校开展革命化，要依靠党团组织。快要高考了，你们应认真准备高考。

工作队采取了化整为零，分头谈话，降低温度的策略。高干子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工作队进校前后，高三2班的团支书任小彬（父亲任彬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杜若时任西城区区委书记）曾找校长、党支书解才民，表达个人意见：“现在学生运动没有党的领导，学校的运动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解才民反问：“我的话他们听吗？”对任小彬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任小彬文革后对笔者说，他当时属于建制派。

1965年1月初，工作队在阶梯教室召开了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工作队队长李晨讲了话。笔者只记住了李晨的一句话“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四中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工作队把高三4班毕向明定为全高三年级重点批判对象。毕向明是笔者所在班的同学，他来自农村，祖父是富农。他重视学习，不大关心政治。全班召开了批判他的会议，工作队有位李同志在场坐阵。同学们批判毕向明走白专道路，还要他交出家里的“变天账”（指49年土改前的地契），

这是学生们从流传的农村四清的故事中学来的。工作队李同志也做了批判毕向明的尖锐发言。

在高三4班一次批判毕向明的会上，大家“逼”毕向明交待反动思想，毕交待不出来就过不了关。再三逼迫之下，毕向明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进中南海，炸中南海。”“你根本进不去中南海，怎么炸？”“有的同学有进出中南海的证，我可以借证件。”毕“供”出反革命思想后，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后，自然是一片“打倒！”之声。会后有的同学跑去找工作队，要求枪毙毕向明。

当时高三其他各班都召开了批判毕向明的批判会。毕向明被工作组定为“敌我矛盾”，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让参加高考，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文革中，农场曾伙同毕家乡的人，差点把毕向明打死。文革后，毕向明找到当年工作队队长李晨，李晨说，“孩子，你受苦了。”李晨为他写了平反证明，而后毕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工作。1985年2月22日，四中校友返校聚会，65届高三4班聚会由毕向明操办，同学们对毕分外热情，表达了对他的歉意。刘安东两次向毕明非常诚恳地道歉。毕向明嗜酒。2002年因病去世，20多位同班在京校友全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苏承德文革后回忆工作队发动学生斗学生，认为是为着平息高干子弟对校领导的愤怒情绪，转移目标，矛头向下斗学生。

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新文件“23条”下达后，四中的社教便紧急“刹车”了。“23条”含有两种精神，一方面有着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10条”中过左倾向纠偏的精神，强调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种更左的内容。但北京市委只抓前者纠左精神，强调不能扩大打击面，而回避后者关于重点是整走资派。四中通过传达、学习“23条”，贯彻纠左精神，对运动进行降温、“刹车”。

1965年1月14日“23条”通过当天，北京市委召开六个中学高干子弟“训话”，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到会，听会。这六个中学是：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其中四中、六中正在进行社教，八中正在闹学潮。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强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还说：“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看你们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要听我的。”（这里似乎暗示了党内的矛盾与斗争）万里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注2）

1月17日，四中工作队给北京市委报告，说“发生一部分学生要求枪毙毕向明……我们曾立即加以制止。一部分学生也作了检讨。”

1月21日，彭真在人大大会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的报告，提到北京中学的学潮说“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注3）

1月22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23条”。紧接着，工作队对全体学生宣讲了“23条”。师生们学习、讨论“23条”长达一个月。到了3、4月，四中的社教便停了下来，学校恢复了平静。高三学生忙于学习，准备高考。



发生在1964年秋的468学潮，演变到社教的有六中、四中。八中没有进行社教。在四中校友的文革回忆文集《暴风雨的记忆》中，有几位四中校友作者说，八中也进行了社教，这是不确实的。六中的社教比四中早一个月开始。六中的高干子弟在学潮开始时给中宣部和团市委写信，反映六中的党支部、校长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子弟受压；校领导忽视思想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反映学校领导的问题。1964年11月18日，由中宣部主导，派出工作队，由团中央书记杨海波带队进驻六中。杨海波当时是向陆定一汇报六中的社教。六中的工作队与后来市委派到四中的工作队，两者做法不同。六中的工作队发动师生批判学校领导、校长、党支书。后来有三人被开除党籍。多年后苏承德告诉笔者：“当时派工作队去六中的中宣部陆定一他们，与派工作队去四中的北京市委、彭真有矛盾，做法不同。”笔者认为：中宣部派去六中的工作队，其思路基本上是贯彻执行“后10条”，并受中央两位主席关于有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讲话影响，进校后重点整学校的领导干部。而北京市委、彭真则对此潮流抵制、顶牛，反过来在四中矛头向下，整反动学生，要扑灭学潮。前者（中宣部）在紧跟中央的反修新战略，后者（北京市委）通过传统的反右斗争策略来阻挡扑向领导层的革命烈火。

同期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教（1964年7月至1965年7月），在初期与六中社教有些类似，同样是由中宣部主导，同样是发动群众整领导。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带领工作队进北大后，认为陆平党委“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注4）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北大是姓陆的整姓陆的。”即陆定一整陆平。“23条”下达后，张盘石被撤职，北大社教转由彭真、北京市委主导，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反过来整社教积极分子，批斗他们。这时北大变成与四中社教有些类似，都是矛头向下，打击“反党分子”。但四中是中学，批斗“反动学生”；北大则是在彭真指导下，要把社教左派打成“反党小集团”，而后准备以去农村四清为名，把他们流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不让回城了。北大社教初期与六中类似；后期则与四中类似。但到了1966年5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时，陆定一、彭真却同时被打倒了，对陆定一与彭真并没有区别对待。彭真指导四中的社教与其“二月提纲”中的路线是一致的，都是要阻止文大革命的爆发，要“降温”、“刹车”。《五一六》通知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做了系统的批判，成为打倒彭真的重大理由。按说陆定一在指导文社教口的社教中，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但他却与彭真同时被打倒了，这应是与彭、陆二人都被毛视为是刘少奇的人有关，此外五月会议已确定成立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做为毛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那么掌管文宣大权的陆定一就必须靠边站、腾空坐位了。陆定一被打倒还有个特殊原因，即严慰冰的写匿名信事件。

四中社教的后期与北大社教的后期相比较，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四中社教后期并没有整那些闹学潮的积极分子高干子弟，不但没整他们，而且还做为革命接班人重点培养他们。说到底，这些高干子弟是中共统治阶层的自己人，是“赵家”的孩子。四中在社教后期、高三学生毕业前夕，发展了几批学生党员。第一批是：任小彬（父亲任彬是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杜若是西城区党委书记）、孔丹（父亲孔原是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二批有宋克荒（宋任穷之子）。还有第三批、第四批，都是高干子弟。高三毕业生还有三个高干子弟被保送中央党校，据说是要培养党的理论骨干，有：苏承德、宋扬之、任小彬。当时师大女附中也保送了三名高三毕业生去中央党校深造。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党校青训班。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都是基层干部、教师、普通党员，他们便没有四中高干子弟这种待遇了，他们不是“赵家”的人，他们只有挨整、下放农村的“份儿”。

468学潮的八中，闹学潮曾闹到要罢课，“23条”下达后，市教委说服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等高干子弟，结束了学潮。八中没有进驻工作队，没有进行社教。

高三毕业前，四中高干子弟核心小组的领头人邱承光曾被要求对工作队和校领导多次做检讨，尔后过了关，没有影响考上大学。但他没有被发展入党，也没被保送中央党校。

四中的社教于1965年8月4日最后结束。四中领导班子被北京市委定为二类，属于基本好的领导班子。8月4月，李晨对四中党支部说：对四中的“结论”是：“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注5）不久，校长、党支部解才民被调离四中，杨滨被调到四中担任校长兼党支部。

保送到中央党校青训班的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在文革爆发后，都参加了党校的“红战团”，是康生所支持的李广文的对立派。“红战团”在1967年1、2月反康生，苏、宋、任等人被“中央文革”打成反革命。宋杨之当时批康生极左，指出康生早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整人、在山东搞极左土改，历史上就是极左，文革中又搞极左。苏、宋、任三人从1965的反右到1967年初，立场转变为反极左。

四中社教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到了社教后期，四中的领导、党员、教师都唯恐在阶级路线上犯右倾错误，因此宁左勿右，这就在升大学这件事上苦了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子弟。高三毕业生的档案里有“政审意见”这一项，由于这项意见写的“不好”，影响了许多德才兼备、学习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如果出身所谓不好，本人又不是团员，政治上所谓不追求上进，往往就会被“政审”卡住，高考成绩再好也没用。这给许多小年轻造成了终生的遗憾和伤害。对高三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档案中有“政审意见”这一项，当时属于“机密”，学生们全都被蒙在鼓里，浑不知有此握有人生升降大权的暗中“机关”。在六十年代上半叶，“政审”问题始终存在，并不只是65届毕业生才遇到的无形的生杀关卡，只不过自57年后愈演愈烈，到了65年尤甚而已。对此一涉及人的平等受教育权的重大问题，涉及制度性出身歧视的问题，长期被人们忽视，很少被人提及。

当时党对青年学生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起点是首先要看成份，看家庭出身。随着兴无灭资的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有成份论在“政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四中在文革时期有这样一件事：1968年北师大几个学生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到四中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高考录取上的表现。调查高考制度是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四中前负责高考生“政审”的教导主任屈大同接待了这几位来搞调研的师大学生。屈大同对他们讲：“恐怕不得不让你们各位失望了。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都有个表格，表格上有学校的‘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屈大同说：“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教授，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那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注6）钱元凯当时在华北考区高考总分第二，他报考了清华，但没有任何大学录取他。对此事，文革后屈大同一直感到很内疚。

65年高考贯彻“阶级路线”之严，我们班的李峻是个典型事例，他是当年高考的北京文科状元，报考北大没被录取。据说北大党委会就是否录取李峻讨论过二、三次，最终没敢录取。李峻只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李峻养父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生父49年后去了台湾，成了重大污点。北大是否录取李峻，不是看他本人是否品学兼优，而是对其父辈如“审干”般进行“政审”而决定。

65年毕业这一届，高三2班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多一些。据高三2班原团支书兼班长任小彬在文革后统计，他们班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的有十几个人之多。这个班的吴铁生，学习成绩很好，曾获金质奖章，为人艰苦朴素，笔者还记得他穿的衣服从来都是补丁落补丁的旧服装。但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他本人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的报告，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表示要和家庭决裂，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当时被学校领导树为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典型。但尽管吴铁生如此努力，他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只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们班的同学都清楚，凭他的学习成绩，原本考上清华应是不在话下的。其中的奥妙，党的阶级路线是如何区别对待的细微之处，人们心知肚明。吴铁生现在英国从事计算机管理工作。他曾看到报刊上登载的四中燕纯义老师的文章《待到冰消雪融时——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吴铁生看完此文，给校友们发了一条微信，被校友们广为传阅。吴铁生写道：“受害者不止这些人（注：指燕文中提到的受害的干部、教师、‘反动学生’），咱们初中班、高中班，就有许多受害者，特别是卡在考高中，考大学这两个门槛上。历年历届学生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什么时候能给这些人落实政策，送去‘党的温暖’？”吴铁生认为这个问题十分值得“探讨”。17年中，在全校、全市、全国范围内，历年历届的毕业学生中的受害者，确实是不计其数，这是个巨大的黑洞。对这个庞大的受害群体，已经无法落实政策了，已成了无法挽回之事。当年那些年轻的孩子，为人老实，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被“政审”卡住，不能上大学，或不能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受到终生的损害，而这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害无益，使国家失去了大量可造之才。究其根源，皆因贯彻、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实行“出身歧视”这种政治不正确所至。

文革前高考中关于学生“政审档案”的秘密，近年多有披露，据《共识网》2013年6月21日刊登袁剑平的《文革前的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揭秘》一文揭露：文革前中学的学校领导有责任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对高三毕业生每人进行“政审”，“政审结论”的主要依据，并非个人表现、品德，而主要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或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的，一般是“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高考招生单位先看“政审结论”，后看高考分数。

笔者当年的许多困惑，现在终于恍然大悟。李峻、吴铁生应属于“降格录取”。我们高三4班的俞干、李适功课很好，父亲是右派，都没考上大学，他们应属于与钱元凯一样，“政审”为“不宜录取”。如屈大同讲话“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当年这种秘密“政审”遍及全国所有高中，从57年至65年不知坑害、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多大损害？这一史实，应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载入史册，永远铭记。

我们那一届的四中校友高艳华（高峰），文革后在香港告诉了我一件他高中毕业时的怪事。毕业生填写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表格之前，各班班主任会与本班学生一个一个进行交流，对同学提出参考意见。个别特殊情况会由教导主任屈大同出面谈话。高峰回忆说，他当时第一志愿是报考外语学院。教导主任屈大同与高谈话，对他讲：“你不要报外语学院，外语学院政审条件严。你可报北大，北大是综合大学，有统战性质。”于是高峰报了北大，并考上了北大。高峰回忆此事说“真好笑！北大成了统战单位，我成了统战对象。”关于高峰的家庭出身，也有过一段小波折。四中社教结束时，班主任赵如云老师找他谈话，对他讲，以后填写家庭成份，要把“小商贩”改为“小业主”，因高的父亲在公私合营时有股本2000元（包括平板车、布匹、工具等），属于小业主。如有3000元就够资本家成份了（赶情小业主比小商贩更靠近资产阶级呀）。当时的阶级分析法在中学已贯彻到如此极左与过细的程度。

高峰说他们高三6班有六个同学没考上大学，学习成绩都很优秀，都因家庭出身没上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都报考了大学，或直接读研，后来都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

文革后的一天，四中校友有人打电话给任小彬，约他参加四中“红二代”聚会，被任小彬拒绝，任说“又搞高干子弟高人一等这一套，我不参加！”四中65届高三2班校友多次

聚会，任小彬逢会就道歉，同学们纷纷说“又来了，又来了。你有完没完？”大家早已相互谅解。同学们相逢一笑恩仇，笑谈暴风雨，互祝夕阳好。

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笔者与四中同班好友于火，约会、采访了三个高干子弟校友：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苏是当年四中学潮的核心小组成员，任、宋是较大范围核心圈的成员。大家应笔者之邀餐聚，回忆、反思当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于火虽是当年校团委的宣传部长（学校团干部中的最高层级），笔者是学生会军体部长（在学生选举中得票最高），但笔者与于火在当年社教中都不属于班里核心小组成员（何论全校）。于火的父亲是党员干部，但于火填写家庭成份是“职员”。按任小彬的说法，于火的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但不属于核心层的。”四中闹学潮时，高干子弟圈里说于火“右倾”，我估计这是高三4夺权的新团支书刘安东所说，因他不同意于火进入班的核心小组。笔者是因为家庭问题，父亲是右派。当年团组织、学生会都已靠边站，唯父亲官位最重要，因此我们二人因不在班和年级的核心圈内，对当年四中的学潮与社教内幕了解甚少，苏承德等三人详细回忆、讲述了当年的许多内幕。

苏承德曾于2005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欢聚的大会上，在大会会场站起来发言，向当年曾受到冲击的学校领导刘铁岭、屈大同道歉。（当年高干子弟给北京市委的告状信，曾点名批评副校长刘铁岭和教导主任屈大同。）苏一讲完，屈大同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师生们为二人的发言热烈鼓掌。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片面理解了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认为搞教育革命，当革命接班人的重担落在了革命后代身上；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革干子弟有革命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干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先行者和预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论对联。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搞低头弯腰批斗，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在文革爆发之前，我首先经历了这么一场学潮与社教的风雨洗礼。

注释：

注1：牟志京《似水流年》，收于《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3月版23、24页。

注2：杨隼：《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收于吴称谋主编《红祸文革五十周论文集》2016年版。

注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中《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关于四清运动讲话》。

注4：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64年11月29日条自。2008年版。

注5：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回顾》2001年版。

注6：赵振开《走进暴风雨》，收于《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3月版261、262页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  
【史实辨析】

林彪的一号命令与“谜”无关

· 舒 云 ·

读2016年11月8日《文革博物馆通讯》第886期戴晴的《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其中提到：“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究竟为什么要在1969年突然发布一个准备迎接世界大战的紧急命令《一号通令》。连元帅们都被分遣各地。”

“林彪一号命令”怎么是谜呢？根本不是谜！如果把“林彪一号命令”放在前面，“疏散”放在后面，客观上给人的印象是“林彪一号命令”是因，“元帅疏散”是果。而实际上“元帅疏散”在前，“林彪一号命令”在后。林彪与“元帅疏散”没有关系，他本人也是被疏散的一位元帅。

◇ 中国战备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战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9年3月，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试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战争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提出：“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5月上旬，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10日新疆塔城地区的巴尔鲁克山附近，7月8日黑龙江八岔岛附近，中苏军队以及民间爆发系列冲突，苏联方面吃了小亏。8月13日8时，解放军的三支巡逻队正常巡逻，苏军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铁列克提地区包围解放军的一支巡逻队。5个多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巡逻队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包括3名随军记者在内的20人阵亡，三名战士负伤后被俘，其中两人重伤身亡，一人经外交方面的交涉释放。支援部队有6人阵亡，数人受伤。

大战一触即发。

8月27日，中共中央成立防空领导小组。

◇ 疏散缘于苏联谈判代表团来京

1969年10月20日，是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日子。正值中国战备的高潮期，中国对苏联心存疑虑。

1968年3月，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斯沃博达任总统，大力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苏联则认为这是反苏。7月中旬，苏、波、匈、保、东德5国领导人在华沙开会，联名致信谴责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纲领》。在遭到捷共领导人的反驳后，8月20日晚，一架苏联民用客机谎称飞机故障，降落在布拉格国际机场。飞机上的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迅速占领机场。接着装载坦克、大炮和苏军部队的巨型运输机纷纷降落，苏军很快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官邸、捷共中央大厦等党政领导机关，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与此同时，50多万苏、波、东德、匈、保的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越过边界，次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捷方被迫于8月26日签署公报；10月16日又签订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从此，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欧洲小国被苏联占领。历史的经验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到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商定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9月13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的内容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和边境局势四条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机场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会议上讲话，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

9月26日，柯西金复信称：经仔细研究过周总理9月18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正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同一天，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9月27日，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10月1日，国庆20周年的天安门集会上，总参谋部紧张到了极点，一架直升机停在天安门城楼的北面空地上。一旦苏联发射原子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乘坐直升机离开。国庆日平安无事过去了。

10月6日，周恩来复信柯西金，说柯西金来信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各点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的正式协议。周恩来再次重申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宣布了中国参加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名单。这封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示“同意”。

中苏双方商定谈判时间定在10月20日。

10月14日18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毛泽东判断苏联可能利用空中和地面优势，由蒙古经中国内蒙古，直插华北，迅速占领北京。据此中共

中央通知，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当天到达武汉。

关于中央领导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周恩来阅后下达执行。10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传达中央关于“疏散”的决定。毛泽东具体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

由此可见，“疏散”与林彪毫无关系，林彪也被疏散到了苏州。

#### ◇ “林彪一号命令”的由来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坐飞机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六条。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信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中心意思是“疏散”。秘书张云生向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传达时，并没有冠以“林彪一号命令”，是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根据惯例加的编号。

林彪倒台后，职务行为却成了“反革命政变动员令”。198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指出：“林彪是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正式下达。”为“林彪一号命令”正了名。

~~~~~

####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6月—1968年8月（五）

〔编者按：《北京大学纪事》原由文革后的北大校方撰写，其中1966年6月—1968年8月这一时段资料由樊能廷作了扫描、校对、制表，在此供读者参考〕

（上接 z k 1 6 1 1 c）

#### ◇ 1968年

1月

1月6日 《新北大报》发表《坚决打倒崔雄崑，狠挖17年黑线》的文章，说崔雄崑“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三反分子”。

▲晚8点半，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将崔雄崑释放，送交校文革办公室。

1月9日 西语系职员程远，女，“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校文革“抓叛徒兵团”诬陷为军统特务等，对程批斗并监督劳动，关押在北大招待所，连续审讯、逼供，程自缢身亡。时年64岁。

1月10日 “新北大公社”、“河北大学造反派”联合批斗戈华。

1月11日 《新北大》刊登题为《17年黑线卫道士的新伎俩》的文章，批判“井冈山兵团”的核心组负责人孔繁、杨克明、牛辉林、侯汉清等人，说他们是在和校文革抢夺“批判十七年黑线的大红旗”，是“假批判，真庇护”。

1月16日 校文革办公室《通告》称：“井冈山兵团”的“暴徒抢夺了校文革大印”。

1月17日 “新北大公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揪斗原“红旗飘战斗队”成员谢世扬，说谢是“现行反革命”，加以逮捕。

1月18日 《新北大》发表编辑部写的《严正警告地质（学院）〈东方红报〉某些人》的文章。指责该报刊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把“一切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企图重新挑起首都高校两大派斗争”。

1月22日 《新北大》刊登《坚决把红旗飘里的坏人统统揪出来》的文章，称江青说了“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同日，还发表题为《打倒派性，揪出坏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由反党集团把持的“极右势力”，“必须打垮”。社论要求对方成员“打倒派性”，“揪出坏人”，“造反下山”，“加入新北大公社”。

1月25日 校文革以“迫害林立衡”（林彪的女儿，曾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后以身体不好自动退学）的罪名，批斗陆平、王学珍、孟广平等。

2月

2月13日 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校文革《通告》说：“军队到北大是帮助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

2月15日 《新北大》编辑部发表文章：《不许为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招魂，评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的〈大事记〉》。同时发表《春风浩荡进北大》的社论，内称：“承认校文革、支持校文革、加强新北大的红色政权是实现大联合的原则问题。”

2月 “井冈山兵团”召开内部串连会，介绍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周培源，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他们说李钟奇讲：“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



2月22日 《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校文革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说，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企图颠覆这个政权”就是“实现反革命的复辟”。

2月27日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兵团”代表，说：（一）北大校文革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承认的，你们井冈山要承认校文革；（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革命中是有过很好贡献的，校文革要承认它，不承认是不行的；（三）北大要成立革委会，如何成立，你们回去双方协商解决；（四）解放军支左不支派……。

▲“井冈山兵团”在校内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

2月29日 校文革向中央文革报送224号《情况反映》，说李钟奇、丁国钰28日（按：应为27日）的讲话“引起了混乱”，“新北大公社战士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一）校文革是中央肯定的，无须进行讨论；（二）李副司令员、丁国钰会不会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井冈山兵团造谣？”

3月

3月7日 《新北大》刊发红一团勤务组《实行每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的决定》。《决定》规定：（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

3月14日 “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成立，表示拥护校文革，反对“井冈山兵团总部”。

3月20日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为响应江青于3月15日和18日所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的两次讲话，校文革组织四千多人到天安门游行，提出“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黑风”。

▲聂元梓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指定高云鹏为总指挥，宫香政、黄元庄为副总指挥，卢平为政委。

3月22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一千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

3月23日 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的文章。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新北大》发表康生、江青3月15日和18日接见浙江等代表团的讲话。康生说：“什么叫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

是主要危险”。“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他一炮”。“北京地派黑手抓出来了，就相对好些；天派抓得少，有后台，还在闹”。

3月24日 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北大两派在校文革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走”。“我们要坚决打倒两面派、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3月26日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

3月27日 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西语系讲师蒙复地，“文革”中被抄家、审讯，在家中自缢身亡。时年36岁。

3月28日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3月29日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武斗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

“井冈山兵团”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当日上午11时，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他并宣布：为制止武斗，组织调查组调查。

晚，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讲话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

当日，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杀犯的《通缉令》。

3月30日 《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

4月

4月1日 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一号动员令》，称：“刺杀聂元梓是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政治陷害”；号召其成员要“揭穿这个大阴谋”。

4月4日 校文革召开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大会”。崔雄崑主持大会。会后，焚烧象征以上这些人的“草人”。

▲晚，李钟奇来校，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内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和后台。

4月5日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二号动员令》，说“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

4月8日 《新北大》刊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坚决揪出井冈山兵团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文章。

4月11日 北京市革委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检查小组”负责人作《关于揪出反革命凶杀犯及其后台的广播动员》讲话，说“井冈山兵团”至今不交出凶手和后台，“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行为”。

4月19日 “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4月21日 历史系教员李原，被关押毒打重伤后自缢身亡。时年40岁。

4月25日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36楼。

4月26日 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4月27日 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24岁。

4月下旬 聂元梓、孙蓬一下令组成“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品忠、韩琴英（也有记录为唐春英的）、徐运朴、王忠林等十余名师生，进行严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

4月 校文革将我校一百三十余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劳改大队以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为总负责人。

5月

5月4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热烈欢迎井冈山广大战士造反下山的通告》。

5月7日 北大附中炊事员王厚，解放前作过伪警察，早已审查清楚，属一般历史问题。“文革”中有人把他的档案抛给学生，红卫兵即对王进行打斗，王投河身亡。时年49岁。

5月9日 《新北大》刊登“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

5月13日 《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

5月14日 校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井冈山兵团广大群众的几项规定》。其中第五项称，“对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坏头头，必须斗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惩不贷。”

5月15日 校文革召开“欢迎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下山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说：“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操纵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5月16日 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惨。

5月22日 “新北大公社”发表《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

《公告》点了一批人的名，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5月23日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的文章，点了一批学生的名，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

5月底 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

6月

6月2日 《新北大》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要“刮起更猛烈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新风暴”，说北大“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彻底摧毁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

6月6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关于粉碎翻案妖风，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项决定和江青重要指示的严正声明》。《声明》称：“江青指示，抓凶手和后台绝不能手软。”

6月7日 校文革《情况反映》向上报告：建立了全校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有：孙蓬一、王海忱、唐春景、谢甲林等。

6月12日 北大附中教务处职员李劼（女），有历史问题（早已做过结论），被人把她的历史材料抛给学生，学生即对其进行频繁地批斗、毒打，直至被打死。时年49岁。

6月14日 《新北大》发表《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文章，说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是刺杀聂的“凶手主犯”。

6月24日 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28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

▲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卢锡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诬有“重大历史问题”，立案审查，多次进行批斗、逼供。卢于24日夜自刎身亡，时年45岁。

6月27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关于彻底砸烂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三号公告》。《公告》将原“红旗飘”的九个学生点名定为“现行反革命”或“骨干分子”，说，这是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

上半年，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及“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7月

7月4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批斗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大会，将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等三个学生揪上台批斗。

7月11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发布《关于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

7月16日 化学系器材室副主任林芳（女），是卢锡锬同志的妻子。卢被迫自杀后，林感到压力很大，生活绝望，于16日夜投湖身亡，时年41岁。

7月17日 校文革举办1967年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7月18日 校文革召开“首次公审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大会，审讯三个学生。

7月20日 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时年24岁。

7月22日 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断电、断水后，“井冈山兵团”即计划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于今天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樊注：当年为32路。）

7月27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又称工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当晚，聂元梓、孙蓬一召集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商量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的对策，商定：（一）拒之门外，让宣传队派代表与校文革商量；（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领着大家到北大荒去等。会后，连夜往楼内运送硫酸、燃烧瓶等物品。

7月28日 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主席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等五人。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以上内容是根据被召见人整理并正式公布的记录节录的）。

▲当日，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但《通告》仍强调要落实谢富治3月29日宣布的“四项决定”。“新北大公社”总部发了表示支持《通告》的《声明》。《声明》同时要求对立一方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7月29日 “新北大公社”写了《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封信》，表示欢迎宣传队到北大来，帮助、监督他们落实“七三”布告，“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上交一切武斗工具，无条件地制止一切武斗”。同时强调“在校文革领导下实现大联合”。

8月

8月5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四号公告》。《公告》说该兵团第一把手侯汉清是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向正在作垂死挣扎的反革命集团发动猛烈进攻”。

8月8日 《新北大》发表《掀起大学习、大落实毛主席“七二八”指示的热潮》的社论。社论同时仍称对立面是“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打倒，坚决镇压”。

8月11日 图书馆馆员（讲师）许世华，因要求为其右派结论平反，被认为是“右派翻天”，受到批判，他感到绝望，于本日投河自杀身亡。时年48岁。

8月17日 《新北大》第200期出版，从此停刊。

8月19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92人）、第二机床厂（60人）、北京齿轮厂（60人）、外文印刷厂（60人）、财经印刷厂（20人）和63军（4587部队）（200人）等六个单位组成，共492人。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宣传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一机床厂军代表）、局成俊（一机床厂工人）、魏秀如（女，二机床厂工人）、华广信（齿轮厂工人）、焦克琛（外文印刷厂工人）、李景斌（财经印刷厂工人）等六人。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还有宋双来（63军188师政委）和田双喜（187师参谋长）。宣传队共编三个团，每团三个连，连为军、工分编。

指挥部下设：秘书组、政宣组、联络组、后勤组和群众接待组。

当天，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总部给宣传队写了《欢迎信》，表示欢迎。《信》强调校文革是“红色政权”，要“在校文革领导下，在宣传队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两派大联合。

8月20日 晚8点至凌晨零点30分，驻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等。

宣传队当即接管全校广播台。21日凌晨2点，向全校广播了第一号协议。两派分别开庆祝会并游行。

▲同日，“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据校文革《情况反映》统计，有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

8月21日 晨，“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枚。

▲“新北大公社工人兵团”和“井冈山”19、20纵队两派代表在宣传队的主持下召开工人大联合座谈会，达成两派工人组织立即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协议声明：脱离原总部领导，立即取消原组织，“成立统一的组织——新北大革命工人大联合委员会。大联委正式产生前，双方各派八名代表代行大联委职权，负责发动群众实现按系统、按行业的联合，狠抓阶级斗争”。

▲晚，宣传队有关人员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包括分裂出去的）作第一次接触。宣传队向聂元梓、校文革提出三个质询的问题，要求解答。如：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提供武斗方便，要不要承担武斗所造成的损失的责任等。接着校文革做出四项决定：（一）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二）把未领的工资给“井冈山”人送去并检查错误；（三）聂元梓接受批判；（四）给“井冈山”人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

8月22日 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但《协议》规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政治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

8月23日 “新北大公社”将23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

同日，在宣传队指导、帮助下，校文革举办校文革常委、系文革主任学习班，端正对宣传队的态度，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解决解散跨班系的群众组织回班、系实现大联合的问题。

8月25日 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发表，说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

8月27日晚，“新北大公社”召开串连会，提出两派都倒旗，回班系进行大联合的方案。由宣传队工人、解放军、两派代表组成大联合委员会，由工人（或解放军）当组长。

8月28日 “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纵队长以上干部会，讨论大联合问题。

▲晚，“新北大公社”全体（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会上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回各班系、各单位闹革命”，并提出要狠批“山头主义”和“反动的多中心论”，“甘当工农兵的小学生”。

▲宣传队发出《通告》，宣布要回到各班系去，由宣传队领导，按班系搞大联合。

8月29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宣布兵团总部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声明提出在宣传队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新北大革命委员会”。

8月30日 两派学生今天开始自动搬回原各系宿舍楼居住。

8月31日 全校18个系，已有10个系实现革命大联合：即物理、地质地理、东语、西语、俄语、技术物理、数学力学、地球物理、国际政治和哲学系。

9月

9月1日 工、军宣传队举办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两派头头“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聂元梓、孙蓬一、姜同光、卢平、侯汉清等24人参加。办班的指导思想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摧毁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团结一致对敌，完成斗批改使命。

9月3日 全校实现大联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